

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¹

杨颖育

(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目前还有许多空白点，在广泛收集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文献综述、对有特色的代表性译本进行分析，对多译本的编排与阐释、译者翻译策略选取的历史文化动因等方面进行详尽的阐释，并提供译者、译著、中英文对照表等相关文献学资料。国内《孟子》研究与英语世界《孟子》研究在材料取舍、术语解读、价值取向等问题意识上所呈现出来的异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学界对此的基础研究不多，从译本的细读中发掘他文明中的《孟子》阐释，通过描述、分析、挖掘并最终利用西方学者在《孟子》研究上所表现的不同视角和方法。

关键词：孟子；英语世界；变异与接受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16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传教士罗明坚等人开始将儒家典籍的《孟子》翻译成拉丁文等西方语言，距今业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此后，《孟子》的翻译和相关儒家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中西交流的重要内容，为历代汉学家和史学家所重视。史海钩沉，《孟子》先后被译成拉丁文、意大利语、俄语、法语、英语、德语、芬兰语、日语和韩语等十多种语言，其影响随着《孟子》文本的译介远播世界各国，不仅成为亚洲各国儒家文化的滥觞，也对西方各国的哲学、人文、道德和社会意识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明、清以降，《孟子》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和研究经历了由疏入密，由浅入深的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无论是译本的语种和数量的增加，还是有关孟子“性善论”、“仁政”学说、“心性”之学、“义利之辨”“生态伦理”或是儒家伦理的专题研究，亦或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与西方哲学思想的对比研究，都经历由表及里，由深入浅的过程，现已自成格局，蔚为大观。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并存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如何在本土以及他者的双重视域中不断拓展，成为儒学现代化的挑战。这就不仅需要我们打通古今，而且必须融汇中西。只有在充分利用、借鉴海外译者、汉学家、对比语言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多角度、多层面的译介、阐释以及多种对比研究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不同的文化语境、不同的学科范式、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反观自身，逐步形成中西对话——回应的系统，形成跨文化的立体及双向互动研究。在众多不同语种的译本中，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一直是千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必然和首选的翻译对象之一，《孟子》英译不仅具有持久性和学术性的

¹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孟子》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研究”（12BW146）、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11YJC740134）研究成果。教育部项目最终成果《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于2014年12月出版，全书共35万字。

特点，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反复重译，为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流服务，《孟子》英译研究具有跨时代、跨语言、跨诗学、跨文化的互文性，英语世界的学者在这个开放的文本空间中不断阐释孟子的意义，也给国内的孟学研究很多启示，赋予了《孟子》文学、哲学、美学意蕴的不断增值。

通过对《孟子》英译本进行历时性的回顾，我们勾勒出《孟子》英译在英语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译介和传播的发展态势，划分了《孟子》英译与传播的三个主要历史分期：第一个时期是 16 世纪——19 世纪，各国传教士是孟子早期在欧洲的传播的主体，他们基于对基督教的信仰把宣扬基督教、说服中国人信仰耶稣当作神圣职责，他们在传教的同时，译介了大量的中国典籍，尽管其主要目的是为传教扫清障碍，但客观上也为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一时期介绍中国文化的专著主要包括 1581 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的《孟子译本》（未刊行）、最早法译本《孟子的哲学、才干和信条》等，其他介绍中国文化的专著中也有零星的对《孟子》的介绍。由此可见，《孟子》是最早翻译到欧洲的中国典籍之一，主要是作为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译介的，单独成书较少。篇幅、种类也较少，译者主要是传教士和早期旧教耶稣会士，随后新教传教士也陆续加入，同时也得到了何进善、王韬等中国人的协助。在翻译过程中文化差异的碰撞时有发生，如“礼仪之争”以及关于孟子译介过程中的“性向善”和“性本善”的讨论，凡此种种都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在语种上也经历了从单一拉丁文到多种语言的版本的变化，图书刊行经历了由无法印行到复译版本众多的过程。第二个历史时期是 19 世纪以降，世界各地的汉学家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在传教士译本对中国文化和汉语介绍的基础上，纷纷推出《孟子》全译本和比较详细的节译本，对《孟子》及其儒家思想做全面的介绍。这一时期的译本史、论结合、翻译与研究并重，往往附有较为详细的孟子生平年代、相关儒家术语的索引等等。1828 年 David Collie（柯大卫）的《孟子》英译本是最早的一部英语世界《孟子》译本。这一时期的孟子译介语言以英语为主，译者也由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传教士逐渐开始转变为深谙中西文化、热爱中国文化的知名汉学家。出现了介绍中国典籍的译本，还有关于《孟子》的专论。这些都说明关于《孟子》译介在学术界引起关注并已取得一席之地，为后来 20 世纪各种《孟子》英译专著的大量涌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个时期是 20 世纪至今，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相关的《孟子》译本大量涌现，形式多样（包括全译本、节译本），还有多部专论。《孟子》译介以及孟子思想研究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大量中国译者和中国出版社也推出了各种形式的《孟子》全译本和节译本。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大中华文库系列”的典籍英译，国家领导人出访国外，往往将此系列丛书赠送给国外的图书馆和大学。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者以外国汉学家为主，如瑞恰兹、安乐哲、倪德卫，也有华裔学者，如杜维明等。译本中有对《孟子》的直接翻译也有对其思想、文化的考辨和评论，这也进一步深化了《孟子》译介与研究的发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研究的阶段与中西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译介学的角度对三种有代表性的《孟子》译本：理雅各英译《孟子》、刘殿爵英译《孟子》、赵甄陶英译《孟子》进行对比研究，我们发现三译本中的“文化过滤”、“文化变形”、“文化误读”并非简单地可以根据译者国别做划分。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行为，不仅仅是单纯的语义转换。这是因为源文本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义给予接受者以启发和冲击，接受者在这种对比性的价值参照中消化、吸收和利用原文本的文化资源。首先，对英语世界重要的《孟子》英译本的部分内容进行文本分析，考察他们的学术背景、翻译的目的、译作产生的影响以及相关的评论，其中包括《孟子》书名与篇章名目、主要术语及句子的英译评析。阐述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误译，从翻译的语言现象中探究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原由，试图通过他们对《孟子》的再释，发现西方人看待中国典籍的立场。同时，也对比分析华裔背景的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的杰出贡献，他们对英语世界全方位理解《孟子》文化精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通过对比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方面，谙熟中国文化，热爱儒家典籍以及认为中国典籍可资作为西方分析哲学有益补充的外国译者，由于其期待视野的调整，也完全可能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更多地保留中国文化中独有文化术语和思维模式。甚至保留孟子的语言风格，如《孟子》“义深辞畅”、雄辩滔滔的语言表达方式。这样的译本就为英语文化和语言增添了新的元素。因此，中国文化的异因子，在思想和语言两个层面都能在英语世界中得以有效保留与传播。另一方面，中国译者为了适应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有时也会采用简化和通俗化的阐释策略来翻译中国文化中的独有元素，其目的在于推广中国文化，使得《孟子》这样的儒家典籍在普通读者当中能有更强的可读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源语文化中的文化负载词及儒家术语翻译的充分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被降低了。

通过译介学和文化翻译学的角度对三种有代表性的《孟子》译本进行对比，特别是对《孟子》中核心术语英译进行研究发现，译者对这些代表孟子基本思想内涵的术语，如“性善论”、“仁政学说”、“知言养气”、“知人论世”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孟子》的译介和传播与接受。接受者自身固有的文化期待视野、价值观念和哲学体系、意识形态等都会形成独有的接受视域，于是语言的转换，信息的传递有了比单纯的文本语言转换更加丰富、更加复杂的轨迹，犹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就《孟子》的译介而言，从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20世纪留英博士刘殿爵、中国著名当代毛诗翻译家赵甄陶的译本比较和分析中，不难看出“善”、“天”、“性”、“仁”、“气”等“心性之学”的儒家术语在中国语境中的非哲学本体内涵，在西方译者“以耶释儒”等文化简约主义的翻译策略的操纵下，这些儒家独有的术语和概念隐喻也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基督教的“上帝”和“天”的映射。纵观《孟子》的英译本及相关学者对孟子思想的研究。我们发现，西方汉学研究既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表现出异质文化背景中特有的思维方式。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对立与调和、接受与变形及其不断地与目的语环境相互作用从而推动当时的社会文化建构，如以波士顿神学院院长白诗朗等为代表的“波士顿儒家”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子。海外学者更注重在译文中反映出原文所独有的诗意境界，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字的了解和认知程度使他们更愿意用自己

的语言来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孟子》一书，义深辞畅。这就给中英语言转换以及思想阐释留下了广阔的译介和阐释空间。西方译者和研究者意识到《孟子》诗性的语言和充沛的情感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本世界，为《孟子》的译者和研究者提出了了解中国儒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哲学体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孟子》特有的“性善”、“仁政”、“气”论、“民贵君轻”以及“心性”之学等等思想，也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和普世价值。因此，通过译介学的视角对《孟子》西方译本的考察以及文学的接受研究，就是具体呈现中国文化今日西方语境的基本过程。通过描述性研究揭示中西方文明碰撞和交流的语言转换和思想博弈的具体表征，努力还原译者和研究者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诗学以及不同意识形态影响下对《孟子》文本解读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及其背后的文化动因。尽管文本中的文化因子在他文化中的接受必然经历变异，移植、转换、变形等过程，然而，唯有如此，异质文化才能通过交流和沟通逐步进入相应的文化系统发挥作用、相互影响。同时，通过对《孟子》文本译介和变异过程的描述性研究，我们才能在自我和他者的双重镜像中增值《孟子》文本意义转换的价值和空间。

《孟子》不但是儒家典籍，也是一部文学价值极高的先秦散文集，对后世的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孟子》文本在英语世界的文学翻译研究也是本书关注的话题。围绕《孟子》文本的辩辞、取譬设喻、以及散文风格翻译等三个方面的翻译揭示其文学价值转换的有效性。大多数的汉学家和译者兼具语言学家和汉学家的双重身份，通过译本对比，我们发现理雅各的风格古朴、端庄、文雅清丽，在语义上重考据和索引，对原文亦步亦趋。在形式上，通过精心的遣词造句力图还原《孟子》原文使用单个动词、句式往返重构、对偶句、排比句的特点，以再现《孟子》散文磅礴的气势、充沛的情感等语用特征。本文从文学翻译角度对《孟子》英译进行全面分析。例如，辩辞是《孟子》的一大语言特色，孟子辩辞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运用大量的排比句，其修辞效果是节奏优美、气势奔放、势不可挡，考察不同译者在句法层面如何处理辩辞英译，不同的处理方法中哪些辩辞元素得以保留，哪些文化或句法修辞意蕴被过滤，以及凡此种种翻译现象带来的事实影响。《孟子》的风格特征之一是口语体，而且是雄辩的。主要表现在语音的节奏平衡及押韵、叠音词等等；词汇中简洁凝练的动词、形容词的使用；句法中长句、复杂句、简略句、否定句、倒装句、排比句、设问句等等。通过对散文风格英译研究，分析译者在处理这些风格时所采用的策略，考察风格可译性的限度以及风格翻译的策略。比喻论证，作为一种形象化的论证方式，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孟子尤其善于用生活中的常见事物来说明复杂抽象的道理和他所推崇的道德价值观，然而比喻中的形象转换历来是译家难事，我们对比喻的形象转换或文化意象的移植及其效果展开讨论。中国学者在翻译过程中更注重反映出原文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准确含义，并尽量将原文中的言外之意在译文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以赵甄陶等为代表的中国翻译家强调译文的中国文化的传承，也考虑到现代目的语读者的语言期待视野，往往采用比较通俗、明确的语言和符合现代英文语法的句式来翻译。对原文丰富的意象、雄辩的气势、排比等语

言风格的转译不够明显。《孟子》一书的文学价值主要是由孟子的辩辞和取譬设喻的语言风格体现出来的，并成为文学研究的重点所在。这一切都与孟子独特的言说方式息息相关，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独特的气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文学思想等等，都通过巧夺天工的各种比喻，借助文学丰富的形象，讲述抽象哲理，最终形成了《孟子》文本诗性言说方式。文学翻译的跨语际变异已成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必然，尤其是作为文化接口的中国传统经典翻译。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同时，中国传统经典的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着新考验及有待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误读”、“误译”等问题亟待解决。中国传统经典兼具艺术性和思想性。对它的翻译和论述既要求译者的英语水平，还要研究者深谙中国传统文化。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著和评述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在翻译与被翻译过程中如何做到文化的还原和形式上的统一也是本文的重点考察目标。

西方的研究者运用西方的语义学理论来研究《孟子》的诗性语言多义的特色，开拓出《孟子》文学研究的新理念和新视角，颇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如瑞恰兹的《孟子论心——多重定义的实验》就采用语义分析和心理语言学的方法对孟子的关键概念进行了分析。瑞恰兹寻求意义系统的多重意义，在《孟子论心——多重定义的试验》的专著中设节探讨了“孟子的心性之学”的问题。这样的方法对后世的西方孟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常为西方孟学研究沿用。因为任何一种价值的自我认定都可能导致一种自我禁锢，文学变异是通过追溯变化发展的历史情境，凸显文本接受过程中文化因子的差异性碰撞，实现互为镜像式的文化互参、互释，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多元共生，以及“互识、互证、互补”。

安乐哲诠释儒家思想的方法可以称之为比较哲学的诠释方法，这种方法在安乐哲的论著中，具体表现为两种具体操作方式：第一，将儒家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第二，将儒家思想放在中西比较哲学的相关联的主题中加以衡量。这种研究着重对“关联性”的文化语境进行研究，强调理解文本的对话性质、交际观念。比如孟子的“知人论世”说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交友之道”，此说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话解释学”，就是说要把古人当做可以平等对话的“活”的主体，而不是“死”的知识。对话的有效性在于说诗者与诗人之间达成在“意”或“志”的层面上的沟通，而不是被交流的媒介——文辞所阻隔，”以意逆志“的实质乃是说诗者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来对诗歌文本进行意义的重构，其结果就是所谓“志”。

纵观《孟子》英译本及其文学文本的接受，20世纪特殊的西方文化反思语境为《孟子》的当代解读创造了一个意义拓展空间。西方文明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以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理论建构为起点，西方哲学从逻各斯到现代社会的绝对理性的分析性逻辑，现代文明由此建立，而现代社会的危机却颠覆了人们对理性秩序的合理想象。西方译者试图在《孟子》中重新寻

找的价值。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智慧中,理性和人类中心主义不如西方世界那样根深蒂固。西方学者在对《孟子》的批判性反思中开始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在审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时,寻找东方智慧。从对孟子的现代接受史的历史梳爬中,我们发现,正是在一种西方反思和东方观照的合力下,才促成了《孟子》的现代解读。中西方文明的交往和对话将会继续在一种更加开放性的语境中展开,而且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以及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和西方都将共同面临着更多文明的反思和重构的命题,如果我们能在维护文化生态多元性和平衡性的前提下,积极搭建文明对话和交往的平台,就能促进中西文明能够在相互理解和融通中促进文明的新生。

随着《孟子》在西方的传播,英语世界对孟子的认识正在加深,影响逐步扩大。通过对海内外学者孟子英译本的详细介绍和分析,总结了海内外较有代表性的《孟子》英译本特色,并进而总结了海内外学者在孟子的翻译过程中的不同宗旨和侧重点。汉学家理雅各国内几位翻译家的译文中都没有对词的“长短句”形式特色有所反映。另外,海内外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拼音体系,西方学者的发音习惯使他们一直采用威妥马式拼音(Wade-Giles Spelling System),而国内学者都习惯于使用汉语拼音。对于词中经常出现的许多重要的文化意象,国内外学者所采用的译文也不相同。海外学者姓名的汉语译文也未能得到统一,各个学者都在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选取不同的译文。这些差异多少会影响西方读者对词的理解和接受。身处西方文化背景中的汉学家所受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在他们对《孟子》的研究过程中依然得到了凸现,在研究中他们自觉地将西方文学理论运用到孟学研究之中。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的视角、方法也比较具有特点,大多数西方研究学者,重视方法论。常以理论阐述为主,注重将多学科的视域引入到孟子的研究中来,翻译中国古代典籍,也应首先“考其文词指意所归”,即弄清字、词、句的含义。这就需要利用训诂资料和训诂方法解决因时间久远、地域差异给人们阅读古代文献带来的文字障碍。其次,要在原文作者的思想体系和时代背景下探求“其义理之所在”。以《孟子》为例,译者在翻译时,应具备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将语句放在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及生活的时代背景下去考究。最后,译者应认识到反向格义的弊端。虽然反向格义现今已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但它在典籍外译中的运用,容易导致西化、非中国化传统哲学,给中国古代典籍增添它本身不具备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因而译者应尽可能避免使用西方现成的概念和理论简单比附中国传统思想。而传统的和中国孟学研究则多是以文本阐释为主,如早期的校注、勘误、集解等等后去学者多对诸子的文论研究的艺术成就进行分析,如文论本身的创作风格,文学特色,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等。多以校、注、书签、等传统的依经立义为主。西方的研究者更多的从结构入手,围绕孟理论,关键词等主题展开研究,往往多以西方文学评论或是哲学思想作为框架和参照系来阐释孟学思想,希望把中国文化的不同元素作为西方工业革命的有益补充。事实上,以英美为主的“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是西方人的眼光用中国的材料来剪裁的中国,是作为材料的中国,而不是方法的中国。

不同的文学传统有着不同的出发点，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而各种传统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西方语言和汉语的迥然不同反过来给西方学者全新的视角。怎样以新的视野和方法论看待老问题，怎样在旧的文本中挖掘出新问题。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可以让我们领悟良多。对于《孟子》的现有英文翻译，学界褒贬不一，不同版本译文的差异，也说明不同的译者对文本的不同理解。“翻译决不仅仅是译者译得好不好的个人的小事，它是关乎到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与发展的重大事件”。（许钧语）翻译者对关键词的翻译的选择和解释，往往能引发中文读者对孟学内涵的更深理解。了解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是进一步了解西方孟子研究的开始，更是系统了解海外儒家文化传播的研究的开始，笔者希望他者视域中孟子研究的得失能对国内孟子研究模式产生影响，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为孟子研究提供较为全面可靠的参考资料和索引，同时也促进国内外学术界的孟学以及儒学现代化的研究。并为与之密切相关的比较文学、翻译、哲学、美学、语言学等提供新思路。

当我们研究文学面貌因为对话双方的参与发生变异时，也就意味着不论是文本放送国还是输入国都拥有了一次文化扩容的机会，因为变异后的文本不可避免地交织着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双重特征，于是自身文化因为吸纳了异族成分而使自己的界域扩大了，而他国文化也因此渗透进了异样的血液，正是这种视域融合的局面促使不同民族的文学传统得以延续和提升。尤其近年来，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孟子文化在全世界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同和传播，成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相关的研究和译注，汗牛充栋。将文本视为一个有生命的、可以跨文化迁移的精神文献而对文本的应用加以阐释；西方学者利用其优势去吸取最新的西方学术信息，以最新潮的文学理论来发现和阐释孟子。如何运用适合的方法论，采用当代的一些视点去重新发现古代传统经典不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著有成效。显然，我们不但要用中国传统的方法研究《孟子》，还应该研究作为世界意义中的本体的儒家典籍。这是因为一种文化要想更完整地了解自己，必须从各种各样的文化交界处反照自己，丰富自己，着重从“他者”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和发现自我，建构异质文化之间学术的互识、互证、互补。刘东在给“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所作的序中指出：“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只有通过中西《孟子》研究的不断对话与创新，才能洞悉相异的文化特质，警惕文化简约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带来的文化过滤和简单的归化，为学界提供镜像式的参考价值。

总之，通过对海内外学者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研究，我们多角度、全方位地描述、分析了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的成果与问题。作为比较文学的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让西方获得对中国文化最深刻的理解；同时，也向读者介绍西方学者对《孟子》的研究方法及其独到的学术见解，也正是在这种文明间日益复杂的互动中，我们发现英语世界中的《孟子》研究已在质量与数量方面达到了可喜的水平，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其研究在许多问题上已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用西方或今人眼光中的

文学、哲学观念对文史哲合一的先秦典籍进行割裂性解读，生硬运用西方理论研究《孟子》文本，对《孟子》文学性研究的低水平重复，研究话语体系面临瓶颈等等。一些单篇论文体现出来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不强，未能处理好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孟子》本身的关系。当然，还有一些空白学术领域等待学者去填补，如《孟子》中有关“心性之学”的思想，以及性善论的伦理价值等等。其中，对英语世界《孟子》研究的重点、特征以及方法论的系统考察，《孟子》与外国思想文化的专题比较研究等目前还显薄弱，需要进行细致全面的梳理总结，以期能为后学者提供借鉴与启发。因此，创造性地解读《孟子》，能给我们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新思维，给解读我国传统优秀文化遗产以不同的文化视角借鉴，为当前人类面临当代科学发展的危机、天人二分思维模式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形而上的迷失”而带来的当代人的“存在的危机”等重大问题。从上可知，《孟子》是一个非常丰富、复杂的系统，具有深远和广泛的内容，具有可供多种理解的宽广意境和对外来思想的同化能力。通过对英语世界接受《孟子》思想所做整体的回顾，进一步比较分析中西《孟子》研究的方法论之异同。英语世界的学者们，在研究方法上，运用西方流行的哲学思潮和文学批评模式所取得的某些结论，对我们有着相当大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在比较中，我们不仅能为中国文化和异国文化架起一座桥梁，而且还能从全人类精神发展的总潮流、总趋势中，更深刻地认识《孟子》精神的实质，发现《孟子》思想对人类精神财富的独特贡献，确定《孟子》思想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永不凋谢的生命力，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

The Study of *Menciu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YANG Yingyu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Abstract: Through an overall review of *Mencius*' thoughts received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 found out that the diversity and opennes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is the charm of *Mencius* translation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Mencius* has been one of the inevitable and priority choices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in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For its enduring and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Mencius* has been retranslated over and over again in different times, still serving as the social and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today.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ng of *Mencius* is an inter-textual process for multiple translation versions in different times, languages, cultures and poetics. The process has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misinterpretation, variation, filter, conflict, and cultural minimalism, the study of the *Mencius*' text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s actually a process of continuously producing and enriching new values, new meanings, and new perspectives.

Keywords: *Mencius* ;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Variation and Acceptance

作者简介: 杨颖育（1972-），女，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教育学院书记/副院长、外事处副处长。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11YJC74013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孟子的跨文化传播及阐释研究”（12BW146），至今已经相继在中文核心期刊以及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发表论文 20 余篇，出版著作 2 部，教材 2 部。